



《石涛画语录》新解

◎ 陈培一 著

《石涛画语录》新解

《石涛画语录》新解

◎ 陈培一 著

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涛画语录》新解/陈培一——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
国际统一书号:ISBN962—437—219—5
图书分类:学术类
发行范围:世界范围

书 名:《石涛画语录》新解
作 者:陈培一
出版印刷:长城(香港)文化出版公司
出 品 人:吴汉龙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2万字
印 张:6
版 次:2006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962—437—219—5
定 价:20.00元港币/人民币

石
涛
画
语
录

新
解

目 录

- 序 之一(钱绍武)/4
 之二(董乃强)/5
关于石涛其人/9
石涛年谱/24
关于画语录/37
第一 一画章/40
第二 了法章/57
第三 变化章/63
第四 尊受章/73
第五 笔墨章/77
第六 运腕章/86
第七 细蕴章/93
第八 山川章/99
第九 皴法章/107
第十 境界章/119
第十一 蹊径章/127
第十二 林木章/131
第十三 海涛章/134
第十四 四时章/138
第十五 远尘章/142
第十六 脱俗章/145
第十七 兼字章/148
第十八 责任章/153
后跋/162
《石涛画语录》美学思想初探/164
权作后记/182
附录：
 主要参考资料/186
 作者简介/187

《〈石涛画语录〉新解》序

我以为这是一本认真扎实的学术研究文集。我欣赏的是它首先细致地作了《石涛年谱》，而一个作家的年谱是对他做全面研究的基础。同时也对《画语录》进行了比较通晓的注释，既不琐碎也不迂腐，归纳得提纲挈领、清清楚楚。这就真正有利于对石涛的深化研究。

石涛是中国绘画界极少数的第一流画家和理论家，对他的研究恐怕会成为“石涛学”。对“石涛学”，培一君做了可贵的贡献。培一的治学是慎重的，他又提出了《画语录》是否确为石涛本人所著的问题。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我看《画语录》的文风和深度，的确是一个深深把握文艺本质的实践者的总结，是深有所感、深有所悟的人才能写得出。也是只有石涛这个集佛、道、儒思想于一身的人才能悟得到的，而且只有是到了晚年才会有如此胸襟和自信，才能有这么不吐不快、倾泄而出的豪情。对是否是亲著，我以为是可以“得鱼忘筌”的。

钱绍洋

2005年5月17日

序

画家培一先生从郊区跑了三个小时的路，就是为了把他的《《石涛画语录》新解》书稿亲自交到我手中，还千嘱万咐地要我给他这部书稿写上几句话。望着他那略显疲惫的神态和浸透他十余年心血的手稿，我忽然感到这部书稿必定很特别：一来因为现在这类著述大都出自专业理论家之手，专业画家则多致力于创作，故而很少见到专业画家的有关著述；但理论家们的著述——恕我直言——又往往未必能准确无误地触摸到画家的真实本意，而画家的有关著述虽然不一定有如理论家们论说得那么面面俱到，但画家之间的那种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领悟却是理论家们所较难企及的。因此我一向主张填平理论者与实践者之间的鸿沟，使理论者获得实践的真知，使实践者掌握理论的武器。二来因为此前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视为愚昧落后、十恶不赦的封建糟粕，而海外的一切（包括那些过了时的理论和洋糟粕）都被当成先进和效法的对象，如画坛上水墨国画受冷落、传统画论遭排斥，不知所云的西方抽象艺术却大走其红就是一例。培一先生没被这种环境氛围所左右，反能十余年如一日地潜心钻研水墨技法、揣摩传统画论。这种承继传统、弘扬传统精华的自觉真是难能可贵！比及再将手中的书稿略一翻阅，只见其中不止有对石涛《画语录》的注

释,还涉及到石涛的生平行述、年谱、美学思想和对《画语录》成书的质疑等诸多内容,洋洋洒洒,真可算得上是一部研究石涛的百科全书了。于是又感慨培一先生的用功之深。

对于石涛,我知之不多,只晓得他是位书画大家,主张“笔墨当随时代”和“法自我立”,即不拘古泥古,给当时画坛上的仿古之风来了场革命;并提出画山川时先要“搜尽奇峰打草稿”,将千山万壑百态尽藏于胸,以便作画时能“脱胎于山川”,以抒山川似与非似之间美的神韵。仅此而已。故没有多少发言权。但对于百科全书之类的工具书,自信还是可以说上几句的。

工具书对编写人物传记、人物年谱的要求是史料的翔实和叙事的准确。——当然,“翔实”与否的关键主要是看当时面世资料的多寡——以这一标准衡量书稿中的“关于石涛其人”一节,我认为还是相当成功的:在我所见过的石涛传记中,它是叙写石涛生平最为详尽的一篇;但不止是详尽,更重要的是还对石涛的游踪、住地等进行了多方考证,给叙事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至于年谱,历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给石涛编制年谱者不在少数,这些年谱提出的石涛生年自1630年至1642年不等、石涛卒年自1707年至1725年不等,前后竟然相差了30年!培一先生没有囿于前人旧说,更没有盲从权威,而是在认真比对了自已搜集得来的大量资料后,提出了1640年至1707年为石涛生卒确切年份的一家之言。这种独立思考探求真理的精神是很值得提倡的。

对古籍整理校注的要求是收集所注古籍的版本尽可能的齐全,其中错讹漏脱的字及衍文均应注明,注释应尽可能的准确、详尽、通俗,等等。这些要求书稿的正文大体上都达到了;如在版本选择上,书稿使用了俞剑华以《四铜鼓斋论画集刻》等6种版本互校的《〈石涛画语录〉标点注释》为蓝本,又参照了《知不足斋丛书》等

诸多版本整理纠谬；又如在注释形式上，书稿使用了先录一段原文，再将今人感到难懂的字、词分别加以解说，最后将所录的这段原文用加按语的形式作整体说明，还在各节注释完毕后，于每章的末尾附加白话译文。对原文涉及到的典故，注释中还次第展开、一一阐明。这种形式的注释，既给了读者阅读、理解《石涛画语录》以极大的便利，又最能体现作者的学术功力。

书稿中论述《石涛画语录》美学思想的研究文字，可以视作一个后学画家对前代书画大师艺术历程领悟的心得。因其通篇并不从艺术哲学本体分析论证，而是以画家主体来探讨阐发。这种论述方法使人既感亲切而又易读易懂，值得倡导。在这节文字论述石涛“一画”之道的生成时，培一先生提出的“凿（混沌）七窍而混沌不死”的观点引发了我的兴趣。此说源于《庄子·应帝王》中的一个寓言，即南海之帝儵与南海之帝忽为报中央之帝混沌之德，给混沌“凿七窍”反而致混沌于死地的故事。我以为这个寓言在告诫人们不要用好心办错事的同时，也将一种形态是绝对不可能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的思维模式强加给了人们，但这一思维模式并不见得正确。我们可以用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为例说明：“君子不器”是说君子大德多才，不像一件器皿那样只有一种用途。如果我们想让这位君子只发挥他的一种用途，就好比将这个“不器”的君子硬装入一个固定的器皿里，使之变成一个“器”。那么，在这个由“不器”而“器”的过程中，“不器”的“君子”不见了，而原本不存在的“器”却生成了。可见这里“君子”由“不器”而“器”只是形态上和用途上的转换，并不是“君子”实体的消亡。《庄子》中“混沌”寓言与孔子的“君子不器”类似，有大德的中央之帝混沌本身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混沌被儵与忽“凿七窍”即儵与忽企图将混沌造成一种固定形态，混沌之“死”则表明混沌博大到根本不可能被固定成某种形态，

更何况被固定成某种形态后的“死”也并非标志着其实体的消亡，而是在昭示它已经从当前的形态转化成了另外一种存在形式或者业已还原成原来的形态了。

在书稿的“权作后记”的文字中，培一先生用提出问题的方式对《石涛画语录》的成书过程提出质疑。我赞同这一质疑。但这里要提醒大家应仔细核实与正确使用所获得的材料。例如这段文字所引《清史稿》列传 291 的“释道济”条，其本身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根据绝大多数文献的记载，“道济”指的是“济颠”即济公，而“原济”才是石涛；二是史学界普遍认为，《清史稿》的内容缺漏错误之处颇多，史料价值不高，剪裁组织也不完善，不可作为信史对待。因此引用《清史稿》应当慎重。推而广之，引用一切资料都不可太随便。例如《辞海》“原济”条的释文中“《苦瓜和尚画语录》（其手写刻本名《画谱》）”的说法也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决非定论。因为《辞海》中的遗误待补之处同样不少。我自购了一部《辞海》普及本 1999 年版，购到后信手一翻就发现了一些舛误，并在 2000 年 9 月 7 日的《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可见对于我们搜寻得来的材料，务必要严加考证确认无误后再行使用，以增添科研成果的可信度。

以上就是翻阅这部书稿时偶生的一些杂感，拉杂写来权充为序。

2005 年 4 月 19 日

关于石涛其人

石涛，清代初期杰出的画家，明朝宗室靖江王后人，出家为僧，与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髡残（石溪，约1612—约1673）、弘仁（渐江，1610—1664）号称“清初四僧”。石涛作画，“笔意纵恣，脱尽窠巢”，“专主气势，以充沛为能，不事摹仿。然其工力卓绝，偶一回腕，几于针缕皆见，遂开黄山一派”，成为一代宗师。他以自然造化为师，追求艺术个性的创作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画坛三百余年。据说，石涛还是个造园叠石的高手，扬州某园林就是他的手笔。

石涛的名号很多，如“原济”、“元济”、“阿长”、“苦瓜”、“钝根”、“瞎尊者”、“大涤子”、“清湘陈人”、“清湘遗人”、“清湘老人”、“靖江后人”、“零丁老人”、“超济”、“道济”（石涛原本无此法名，自清乾隆后多见于史载。《国朝画征续录》卷下、《扬州画舫录》、《清史稿》列传卷291等都以“道济”为石涛法名。石涛的师祖为道忞，他焉敢称道济？）、“枝下叟”、“小乘客”、“济山僧”、“万道人”、“一枝阁”等等，不胜枚举，多是由于年龄的增长与心情的变化而在不同的阶段使用。其名号之由来，有对故国明王朝的追思怀念，有对自己不幸身世的不平，有对家乡山水的眷恋和赞美，有对先祖和导师的遥念。湘漓二人同源，在全州境内合流，所以石涛有“清湘道人”、“粤山

人”、“湘源济山僧”之称。晚年，以“大涤草堂”、“耕心草堂”署其居。

石涛一生绘制了无数写实的花卉和山水画，他少年时就开始了绘画生涯，而且是早熟的画家。据他自题《兰竹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可知其果真如此。他一生云游天下，登山临水，泛棹江湖，剪裁了无数绝妙的画本。他的作品，笔意恣纵，淋漓洒脱，奇险中兼绕秀润，千变万化，丰富多彩，不拘一格，具有大胆的革新和创造精神，不落前人套子规矩，自写自画，自有我在，故能脱尽恒蹊。他认真地搜尽奇峰打草稿，他的云游生活对于他的艺术成就起了重大作用。石涛的绘画题材广泛，每物每画均有其独特的构思布意，有他自己的笔络和墨法，以至画中的题诗书跋都有着自家的格局和风趣。石涛对艺术的理解是较为深刻的，他所撰写的《画语录》词意深奥、颇多禅机，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也足以说明石涛的美学思想已自成体系。

—

石涛和尚俗姓朱，小字阿长，广西人。一说为梧州人。清康熙陈鼎在《留溪外传》中所载《瞎尊者传》说：“瞎尊者，失其族名，广西梧州市人，前朝靖裔也。”一说为全州人。俞剑华先生所著《〈石涛画语录〉标点注释》载郑拙庐撰《石涛传略》说：“石涛大概在广西全州住过一个时期，所以有人说他是全州人。”傅抱石先生在《石涛上人年谱》说他是“全州清湘县人。”此说的原由，可能是石涛在画的题跋中屡屡提及在全州合流的湘水。石涛为靖江王孙，藩邸在桂林，石涛出生在桂林较为可信。

石涛法名原济又作元济，又名道济(待考)，表字为石涛，为明朝宗室。查《明史·太祖本纪》和《明史·诸王列传》，明太祖朱元璋之

从孙守谦在洪武三年被封为靖江王,封藩在桂林。守谦的嫡子悼禧王赞仪继承王位,是石涛的十世祖。自赞仪而下的靖江王世谱为:朱佐敬——朱相承——朱规裕——朱约麒——朱经扶——朱邦宁——朱任昌——朱履焘——朱任晟——朱履祐——朱亨嘉。因朱履焘无嗣,传位与其叔朱任晟。太祖封藩时,钦赐“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二十字为支系宗谱。石涛在康熙四十年辛巳之后的书画题跋曾多次款押“若极”二字,毋庸多言,石涛用的乃是其真实姓名,他应是亨嘉之嗣,是朱赞仪的十世孙。乾隆朝张庚因见石涛自号清湘,又是王孙,在《国朝画征录》中说他是明藩楚王朱桢之后,实是一种误会。周积寅教授认为靖江王朱守谦为石涛之父,也是一家之言。(见《中国画论辑·创作论》第56页)

朱亨嘉在天启(1621~1628)、崇祯(1628~1645)之际承袭靖江王之位。1644年,李自成于三月十八日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不久,清兵入关,李自成败走陕西。九月,清顺治帝由沈阳迁入北京。清顺治二年(1645),南京失陷,南明弘光帝被擒杀。不久,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称“隆武”,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称监国,朱亨嘉在桂林挟制了唐王分封的广西巡抚瞿式耜自称监国。后来,瞿式耜和两广总制丁魁楚、思恩参将陈邦傅以及中军焦琏谋反,擒获朱亨嘉,并迅即械往福州,亨嘉被隆武帝废为庶人幽禁而死,期间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此时石涛大概只有四、五岁的样子,被宫中仆人负出得以存活。据推断,此仆人就是后来他的喝涛师兄,二人一同剃度出家为比丘。其身世大致如此。

关于石涛的年龄,由于流传的一些伪迹曾引起考证的混乱,障人眼目,故众说纷纭,难辨孰是孰非。举一例来说,石涛有致八大山人求画的书信,现存真伪二本。经辨别真伪后,方知石涛与八大山

石涛画语录
新解

人相差十五左右。八大山人(1626——1705),明太祖十六子献王朱权十世孙,为八支弋阳王府后裔。石涛应出生于1640年左右。另外还有多种说法,其一:1642——约1718年;其二:1640——约1718年;其三:1642——1707年;其四:1641——不详;其五:1636——1710年。而石涛在《庚辰除夜诗·序》中这样写道:“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恻恻,非一语可尽生平之感者。想父母既生此躯,今周花甲,自问是男是女,且来呱一声,当时黄壤人,喜知有我;我非草非木,不能解语以报黄壤,即此血心,亦非以愧自了生平也。此中忽惊忽哦,自悼悲天,虽成七字,知我者幸毋以诗略云。”自云庚辰年为“周花甲”,在第二首诗中亦云“花甲之年”。依据传统方法计算,所谓周花甲应为六十岁,上推可知其生年应为崇祯十三年庚辰,即1640年,与他致八大山人索画书信真本完全相符,也与他在题跋中流露的生年相符。由自云周花甲和与八大山人索画书信中的自陈,这样较可信的史料可知,石涛的确实生年应是1640年,即明崇祯十三年庚辰。然而在与石涛有唱和之交的李驎所著的《虬峰文集》中,载有应石涛之请所作《大涤子传》。据传中所载,亨嘉国破时(1645)石涛尚二(应为三,疑刊误)岁,其生年为明崇祯十五年壬午,即1642年,另有收进《虬峰文集》中的《清湘子六十赋赠》可为佐证,与石涛的自述相比小了2岁,就显得有些不足为凭。傅抱石先生在《石涛上人年谱》中说石涛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庚午重午日,与其真实出生年月整相差10岁。在《石涛上人年谱》中刊载的罗家伦先生所写《伟大艺术天才石涛》,石涛的生卒年月也从傅说。此说有两个疑点不足为凭:一是从石涛出生(1630年)后到石涛至庐山之前(1650年)的这将近20年,没有交代石涛的行踪;二是国破家亡时,按傅说石涛已经十六岁,得内官以活命。在古代,十六岁可视同成人,已堪大用。这个十六岁的少王爷是个很大的攻击目标,南明小朝廷和

横扫天下的清军那个能斩草不除根，留此后患呢？虽说明清两代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反叛之后或获罪之人出家以后就不再追究，但是出家之前的脱身是很难的，当然侥幸也是存在的。不过这种侥幸成功的机率太小。

二

石涛出家后，随师兄喝涛由湖广到江西庐山，遇见萧士玮。作为信使，由萧引见去江苏常熟会见钱谦益。此时的石涛大约十五岁左右。钱谦益送他绝句十四首，后跋有：“石涛开士自庐山致伯玉书，于其归，作十四绝句送之。”其中之一首云：“兵尘不上七条衣，刀剑轮边杖锡飞；五老栖贤应有喜，昆明劫外一僧归。”诗中对石涛寄迹禅林颇为赞赏，可能石涛向钱谦益流露了自己的身世。傅抱石认为“石涛所托钵的寺大约是栖贤寺”。不管如何，石涛此时在庐山五老峰下栖贤寺无疑。后来石涛回到庐山。钱谦益在《春浮园诗集序》中写道：“丧乱甫息，伯玉遣石涛僧贻书劝以研心内典，刊落绮语。全力笺注楞严，谢绝笔墨，报书曰如兄约久矣。”又“书往而伯玉已不及见。”可见，石涛持书归至庐山。石涛自己在一本山水花卉画册页中题记“丁酉二月，写于武昌之黄鹤楼”，另一开题云：“作于岳阳夜艇。”丁酉年为清顺治十四年，即1657年，此时石涛在岳阳、武昌居住，后至庐山。在后来的一帧扇面题跋中回忆了这段生活：“秋日与文野谈四十年前与客坐匡庐……”，纪年为庚辰，从庚辰上推四十年为顺治十七年庚子、十八年辛丑也就是1661年至1662年之间。后来他云游江、浙、皖、赣诸省，居无定处。在旅庵本月驻锡松江昆山之泗州塔院期间，石涛和喝涛拜之为师，习受佛学精深的教义。在《龙池世谱》里，石涛是南岳下第三十六代子孙，是名僧木陈

道忞的徒孙。他曾刻有“善果月之子，天童忞之孙，原济之章”的石印，以记他的禅学师承之源。旅庵本月佛学渊博，善诗文兼工书法，曾奉诏随老师木陈道忞进京为顺治帝说法，顺治十七年奉旨入善果寺。庚子八月，董贵妃薨，奉旨在景山率二十四僧入坛礼诵超渡。石涛从学于他，佛学和艺术都得到很深的教诲，为后来的“放眼八极”，为高深的禅学和渊博的文学修养奠定了基础。

三

在旅庵本月处“证道”后，大约在1666年，石涛与喝涛来到了安徽宣城，驻锡于广教寺，将倾倒颓败的广教寺修葺一新。后来又挂单金露庵、宛津庵、闲云庵等处。日常除了礼佛参禅、开堂说法外，余则登山临水，吟诗作画，和宣城的名士诗酒唱和，居此十五年之久。他在宣城的朋友大半是诗画大家，时之名士。有施闰章、梅清、梅庚、江注、吴肃公、释半山等等，其中和梅清交往最深，堪称知己。梅清字渊公，号瞿山，又号瞿硎，宣城人，宋朝著名诗人梅尧臣之苗裔。生于1623年，卒于1697年，工诗、善画。石涛的早期山水画受他的影响，而他晚年画黄山又反受石涛影响。二人皆居黄山脚下，皆以画黄山而名世，均是“黄山画派”的代表人物，均有“黄山巨子”之称。在宣城居住期间，石涛潜心于艺术创作和佛教的修养。石涛多次大游黄山，往来于黄山和敬亭山之间。曾无数次地描绘了黄山之壮丽，和黄山共朝夕。他在《黄山图》中题云：“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期万类中，黄峰无不久，”阐明了他和黄山的深厚情感及以造化为师的艺术宗旨。大游黄山，为他创作搜集了大量素材，“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艺术思想正是在这段时间逐渐形成的，并且可能完成了《画语录》的草稿。这个时期新增有代表性的名号有“瞎

尊者”、“苦瓜和尚”、“小乘客”，启用了“善果月之子，天童恣之孙，原济之章”的印章。总之，石涛在宣城的十余年，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四

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的夏天，石涛离开寄居多年的宣城，来到了历史名城六朝古都的南京，和师兄喝涛住在南京城南长干寺，寺内建有一枝阁。长干，是古金陵的里巷名，清《一统志》引《遁志》谓报恩寺前大道，又据《六朝事迹》：“天禧寺，在城南门外，旧名长干寺。”故长干寺又称建初寺、报恩寺和天禧寺。该寺相传于三国吴赤乌十年(247)，孙权为高僧康亮会所建，后被孙皓毁废，旋复。石涛在画中屡题的“长干一枝”，就是指的长干寺一枝阁。在《秋声赋图卷》中，田林跋语：“忆辛酉秋，石公挂锡天禧寺之一枝阁上，”径直以“天禧寺”称此古刹。石涛对长江下游即其所称的江东地区深是热爱，以为第二故乡，经常到青龙、天印、东山、钟陵、灵谷等处踏雪寻梅，吟诗作画，好不逍遥自在。石涛作为一名禅师，在“禅寄长干一枝”期间，经常开堂说法。由于生活安定，佛学修养和绘画水平大有提高，名声日盛。康熙二十四年甲子(1684)，康熙帝第一次南巡至南京，曾巡幸长干寺，石涛正挂锡该寺，欣逢其会，与众僧接驾。石涛在金陵南京数年，与金陵名士交游唱和，友人有王概、杜介、张怡、张樾、程邃、柳埏等人。诗人屈大均在途经金陵时也曾登门拜望他，并赋诗以记。宣城的旧识故友梅清、黄云等也经常往来探视。另外，石涛和张南村、吴宾贤、戴本孝、汤燕生等交情也甚笃。石涛在南京期间，对佛事最为笃信，由北京南返后信念逐渐淡薄，最终脱离佛门而转为信仰道教。

南京曾是朱明王朝的旧都，先代遗迹随处可见。石涛做为明藩王子，曾多次赴钟山吊谒孝陵，并写有《谒陵诗》，在《金陵怀古诗画册》中的题诗也流露出对故国倾覆的无限感慨，这大概也是他热爱江东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孝陵为明太祖朱元璋及后妃合寝的陵墓。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石涛萌生了“至燕京觐天寿诸陵”的念头。二十六年丁卯，石涛赴扬州作北上的准备。在扬州他幸会了著名剧作家孔尚任，并参加了孔尚任发起的秘园雅集。丁卯深秋，石涛自南京来到扬州，欲借道运河北上，赋诗《古墩种松歌(将行北上，赠老友文钵)》和《生平行(留题一枝兼别南京诸友人)》。因突然生变计划不得施行，“北游不果，客广陵之大树下”。自此，他就往来于南京、扬州之间，寻找北游的机会。这一时期新增的名号有“秃发人济”、“石道人”与“石道人济”等。

丁卯深秋之后，石涛曾沿运河南下到了杭州，滞留于海宁长安镇多年，并曾返扬州。康熙二十九年己巳(1689)，康熙帝二次南巡，三月初驻蹕扬州，在平山堂召见了石涛等人，并当众呼出了石涛的名字，这使石涛受宠若惊、感激万分。激动之余，石涛写了《客广陵平山道上接驾恭记》七律二首以记之，对此事颇为得意，又作《海晏河清图》以请赏。然而康熙帝并未领情。可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傅抱石说石涛“上人晚岁北上，曾至长安北京两地。据资料往还达五年之久。惟北上究循何途？沿运河由鲁先入燕？抑溯大江经鄂豫先入陕，今尚不能定。”认为石涛到过关中长安。石涛是否到过关中长安，至今也没有发现确凿的史料证据。那么，石涛在画中屡屡提及的长安是否就是傅抱石先生所说的关中八水长安？很显然不是。石涛本人所谓的长安而是分别指的是浙江省海宁县西北的长安镇和北京。海宁县，旧属杭州府，位于杭州湾。旧为运道所经，宋时筑长安堰。宋德佑初，元伯颜军至长安镇，进屯皋亭山而宋亡。